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八十三期
2015年11月　　頁67~108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15.83.03

太宰春臺《產語》及相關問題再探*

陳　威　瑨**

摘　要

本文以江戶時代儒者太宰春臺之經濟思想著作《產語》為研究對象。首先筆者針對存在不同說法的作者問題進行辨析，指出春臺為該書作者。接著將《產語》思想結構分為治生原則與國家經濟政策兩個層面，以生產、節儉、儲蓄三項要素加以貫串，討論春臺主張的重農抑商想法，並就該書思想屬性問題，指出《產語》乃儒法雜揉之作，而以儒家為主，法家為輔。

最後，筆者論述春臺《經濟錄》與《產語》和當時江戶社會經濟困境之間的關係，同時說明來自徂徠學派的基本主張如何決定了春臺在《產語》中的作法。筆者稍微修正關於春臺的先行研究內容，指出春臺對復古的要求其實甚為關鍵，與其經濟思想之間有密切關係。另外，基於復古要求而對封建制的擁護，並不如春臺所想的足以長治久安，是為其缺陷。

關鍵詞：太宰春臺　《產語》　江戶時代　日本儒學　徂徠學派

103.10.28 收稿，104.08.14 通過刊登。
* 本文投稿之際，承蒙三位匿名審查人惠賜諸多寶貴意見，提示修改方向，獲益良多，又蒙編輯人員細心處理，在此一併謹申謝忱。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儒學思想本包含經世濟民、外王事功之關懷，這一點在日本江戶時代儒學中也不例外。若是談到江戶時代儒學中，政治色彩最濃厚、最著力於治道者，當推以荻生徂徠（1666-1728）為首的徂徠學派。至於徂徠門下，堪稱繼承其經學與政治思想者，則太宰春臺（太宰純，1680-1747）可謂無人能出其右。春臺的政治經濟思想並非冷門議題，其代表著作《經濟錄》對學界來說也不陌生。然春臺在這方面的另一部用心之作《產語》，相對地就較少為人所關注。《產語》曾為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陰（1830-1859）所重視，到了明治時代以降也有多種刊本行世，[1]當有其耐人尋味之處。然此書不僅在內容探討上有待闡發，外緣背景部分也尚有需釐清之處，相關論著極少，可以說對於此書的研究仍未充分展開也不為過。因此筆者試圖對其進行探討，針對先行研究中的相關爭議提出己見，並就其思想內容進行述評，盼能增進學界對此書的認識。

二、《產語》的作者問題

《產語》全書分為上下卷，共十二篇，篇名分別為〈鳥鷇第一〉、〈樂施第二〉、〈有土第三〉、〈琴乙第四〉、〈有人第五〉、〈皐賓第六〉、〈冷無疆第七〉、〈馮驩第八〉、〈四民第九〉、〈文侯問第十〉、〈物價第十一〉、〈良卜第十二〉。篇名取自該篇前兩字，或重要之人名、觀念。內容摻雜作者說理之言、古人對話以及寓言，頗似《莊子》、《管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之形態。《產語》的作者問題乃相關先行研究的最大重點所在，以下先就此問題進行討論。

（一）「秦漢逸書說」與「春臺偽作說」之爭

今本《產語》書前有春臺弟子宮田金峰（宮田明，1718-1783）之序文，書

1 詳見〔日〕神谷正男，《產語の研究　校注篇》（東京：書籍文物流通会，1962），頁23-25。目前尚未有研究指出吉田松陰思想中的哪些部分來自《產語》，但松陰曾以此授課，其圖繪〈松陰先生在時嘗講授產語品川子爵之圖〉，收於現代所印行的《產語》其中一個版本之內，該版本封面註明「吉田松陰愛讀之書」。詳見江戶．太宰春臺，《產語》（東京：研學會，1897），可見於「国文学研究資料館近代書誌・近代画像データベース」，http://base1.nijl.ac.jp/~kindai/index.html。「品川子爵」為松陰弟子、明治時代政治家品川彌二郎（1843-19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有春臺所撰之跋文。跋文全文如下：

> 《產語》十二篇，不題撰者姓名，傳言出於寧樂佛寺之古藏，予則獲諸浪華之市。考自漢以來，歷代〈藝文〉、〈經籍志〉皆不載。書中所言，皆治生之事，而多錄管、晏、李悝、白圭等語，儒家邪？抑法家邪？予不能定其所屬也。夫古書之逸于中夏而存于我　日本者頗多，如古文《尚書》、《孝經》，其昭昭者已，誰知此書非管、晏、李、白之徒所著，亦逸于中夏而存于我　日本者乎？[2]

準此，《產語》乃亡佚於中國的秦漢之書，而尚存於日本。春臺於大阪得見，抄寫之以保存。然而金峰序文強調：

> 王弇州嘗作《左逸》、《短長》也，而曰獲之嶧陽與齊之野，豈以其修辭立說，擬議成章，錯諸戰國秦漢之間，不可間疑乎？亦唯自信之篤如是。夫春臺先生著《產語》十二篇，蓋亦弇州之為哉？……而託諸古之人，亦唯自信之篤，必以其擬議成章，錯諸戰國秦漢之間，不可間疑也。[3]

這裡指出，《產語》實為春臺本人擬古之作，正如王世貞（1526-1590）仿《左傳》與《戰國策》而作《左逸》、《短長》一般，只不過春臺用意在於表達經濟思想，與《經濟錄》相發明，而非單純炫耀擬古功力。

以《產語》作者問題而言，該書跋文與序文可分別視作「秦漢逸書說」和「春臺偽作說」兩種看法。金峰序文作於寬延二年（1749），《產語》刊刻版行之時，乃「春臺偽作說」的最早代表。然江戶時代人僅謂《產語》為春臺所作，其後前澤淵月（1883-1949）在其著作《太宰春台》中，則更進一步記載著：春臺於三十一歲入荻生徂徠門下後，曾將《產語》交予徂徠觀看，並謂其可能為先秦遺文而留存於日本之書。該書文字古雅，以端正楷書寫成。徂徠起先蹙眉不能定，讀畢數篇後，方才斷定此乃春臺所作。其餘在場門人皆感震驚，春

2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跋》，《日本教育思想大系》第 15 冊，《徂徠學派》（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79），頁 393。本文所據之《產語》內容，均依此版本，以下為避繁瑣，省略書目全名，僅標示頁碼。

3 江戶．宮田金峰，〈產語序〉，收入江戶．太宰春臺，《產語》，頁 3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之地位也由此提高。[4]

一直到神谷正男（1910-？）的《產語の研究　校注篇》，才又出現呼應春臺本人「秦漢逸書說」的主張。他整理了《產語》中與中國文獻內容相同處及有待考證處，認為：

1. 《產語》中的漢文不似春臺手筆，此外，《產語》中某些地方有「一本作……」之類的冒頭注文，可見有不同版本存在，這一點是「春臺偽作說」無法解釋的。

2. 春臺曾批評徂徠學派的擬古文風為「糞雜衣」，自身當不致又投入擬古之作。

3. 對於前澤淵月的記載，神谷氏肯定其真實性，但他認為，春臺在其他著作中完全沒有涉及《產語》一書，這表示春臺不欲其所受之誤解大行於世，也不希望自己因此被公然當作是《產語》的作者，因為書中的思想與提倡朱子學的德川幕府相牴觸。金峰之序文，當是受到時人對《產語》作者定論之影響而依附之，並無確切根據。

4. 此書為戰國末年至秦漢間的古逸書，其內容為農家思想。[5]

神谷氏計劃撰寫五本一系列的論著，《產語の研究　校注篇》即為第一本，故其中並無詳細論證。該書問世後，仍未能撼動「春臺偽作說」的地位。他另輯有《產語とその批評》（產語及其批評）一書，[6]內含《產語の研究　校注篇》中的解說文字、來自日本學者們的論學書信、書評，以及臺灣學者的意見。書中所收之日本學界意見，並無學術突破性；臺灣學界方面，較早提出意見者為黃得時（1909-1999）與王叔岷（1914-2008）。他們於1962年聯名寄信給神谷氏，認為：「是書內容，包括甚廣，上自先秦，下迄魏晉，與偽《列子》一書頗相似。疑亦東晉前後，好事之徒為之。其於考訂，校勘古書，有極高之價值，似非太宰純所能偽託。」兩人舉出《產語》中襲自《史記》、《漢書》之處，以及常見於六朝時代，而為《產語》所用的假借字與俗字，據此判斷《產語》乃成於東晉前後之逸書。[7] 但神谷氏認為，若說《產語》因有襲自《史記》文句，故非漢以前之作，則也沒有根據可以斷定：此相關處並非《史記》襲《產語》而成。在神谷氏看來，黃、王二人的論證仍未臻詳細，因此無法接受，仍

4 〔日〕前澤淵月，《太宰春台》（東京：嵩山房，1920），頁 63-64。

5 詳見〔日〕神谷正男，《產語の研究　校注篇》，頁 1-30。

6 〔日〕神谷正男編，《產語とその批評》（作者自費出版，1964）。筆者所見之此書，乃立命館大學圖書館所藏刊本。

7 同上註，頁 56-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堅持「秦漢逸書說」。[8]

另一篇來自臺灣學界的意見，是梁容若（1904-1997）的〈評神谷正男博士著產語研究〉。[9]梁氏亦認同「春臺偽作說」，認為其絕非中國人手筆。其最重要論點為：

1. 《產語》中頗有和臭（又稱作和習，指日本漢文的獨特語病），例如「甚口便捷」、「敢問治生何道之以」、「發政以制之」、「何不似有閩者甚也」，皆明顯為日本漢文而非中國漢文。

2. 《產語》中提到一則「梁人有畜貓者」的故事，[10]神谷氏認為此乃「未詳說話」，即不知出於何處之故事或是對答紀錄。而梁氏指出此乃襲自明朝劉元卿（1544-1609）《應諧錄》，原題〈貓號〉，故《產語》成書時代應不早於明。梁氏依此方式，又指出《產語》中一則講述主角頸上長瘤，而為鬼所取的故事，[11]來自明清笑話書。因此，《產語》乃春臺受明七子宗古風之影響，可能還包括明代豐坊（1492-1563？）、楊慎（1488-1559）偽造古書風氣所致，故託諸古人，以此表達自身經濟思想的擬古之作。

神谷氏的回應可大致撮要如下：

1. 關於和臭問題，神谷氏主張若這些句子為和臭，應亦可見於其他日本漢文，然未見類似文例，亦未聞日本學界表示《產語》何處為和臭。此外，神谷氏指出，「甚口」出於《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便捷」於《毛傳》、《荀子》和《淮南子》中均可得見。梁氏所謂《產語》中的和臭，應當是漢代以降不再使用的死語。

2. 「梁人有畜貓者」為梁氏斷定改編自〈貓號〉，神谷氏認為缺乏根據，不能否定〈貓號〉改編自《產語》，或是兩者皆來自另一本事的可能性。

3. 春臺於四十歲後才開始關心經濟思想，而在將《產語》呈予徂徠觀看時，春臺年方三十一，且尚未脫離朱子學。[12]

以上是《產語とその批評》中可見的《產語》作者問題相關論爭。儘管神谷氏作了回應，但黃、王、梁三人均未答覆。其後，屈萬里（1907-1979）因亦

8 同上註，頁 60-63。

9 收入〔日〕神谷正男編，《產語とその批評》，頁 63-67。該文亦收入梁容若，《現代日本漢學研究概觀》（臺北：藝文藝書館，1972），頁 117-122。

10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皐賓第六》，頁 362-363。

11 同上註，頁 363-364。

12 〔日〕神谷正男編，《產語とその批評》，頁 67-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獲贈《產語の研究　校注篇》，故撰寫〈產語的著者問題〉一文作為回應。[13]該文論點與梁容若文無甚差異，對於黃、王二人之文則既有承襲又有推翻。他認為：

1. 根據黃、王二人有關《產語》襲自《史記》、《漢書》之處的判斷，該書不可能成於漢代以前，文筆亦不似戰國文風。而神谷氏在論爭中反覆強調其研究重要性的「未詳說話」，本出於春臺杜撰，自不可能找到出處。

2. 雖然神谷氏強調《產語》中有許多「未詳說話」，不能單靠「梁人有畜貓者」來說明斷代問題，但《產語》中含有諸多南北朝以降之文例及影響痕跡，正表示「未詳說話」係後人偽造，導致留下漏洞。

3. 除了梁氏所舉的和臭之例，尚有「曾何鳥獸之若哉」、「竊為大王殆之」兩例，[14]故《產語》當成於日本人之手，作者正是荻生徂徠與宮田金峰所指出的春臺本人。

對於屈氏之文，神谷氏又撰寫《產語的著者問題：從論理與論證答屈萬里先生》來答覆。[15]他的回應主要內容如下：

1. 不論是屈文或是梁文，都未提出「梁人有畜貓者」確實是來自《應諧錄》的證據，僅憑情節相似便依此斷定《產語》不早於明代，亦未交代如何看出《產語》乃春臺手筆，有無效推論之嫌。此外，沒有具體文獻證明《應諧錄》曾傳入日本，亦即沒有明確證據可以證明春臺取《應諧錄》之故事作為《產語》之用。且〈貓號〉與「梁人有畜貓者」相較，後者結構較為複雜，僅情節相似而用字不同，顯然頗有難度。三十歲的春臺要寫出這種程度的漢文，極為困難。

2. 文法錯誤不能用來證明該書非中國人所寫。文法學界本身也有學說上的出入，另外作者本人意識，以及古書傳抄誤寫等等，都有可能造成不合文法的現象。且古書亡佚不少，不能因傳世文獻中無某種句型，就斷言中文無此文法。再者，和臭為日本人所獨有，且各人的和臭表現不盡相同。縱然春臺本人之漢文難免於此，也無從斷定《產語》中的和臭確實是春臺所為，因為在春臺的其他漢文作品中，並未出現與《產語》之和臭例相同的表現。

---

13 屈萬里，〈產語的著者問題〉，《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二卷第一期（1968 年 7 月），頁 6-8。

14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鳥穀第一》，頁 336：「然且四體不勤，餬口游食，翫歲愒日，非鰥寡孤獨廢疾，而與乞人同其行者，曾何鳥獸之若哉？」，《產語．四民第九》，頁 379：「白圭曰：『……臣恐一旦有故，羣士解體，竊為大王殆之。』」

15 〔日〕神谷正男，《產語的著者問題：從論理與論證答屈萬里先生》（作者自費出版，1969）。筆者所見者乃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刊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 關於被認為是和臭之例的部分，首先，「何道之以」不是和臭，將「以」字視為「用」，則合於中文句法。僅憑和臭，也無法解決「未詳說話」的來源問題。同樣地，「竊為大王殆之」的「殆之」亦見於《孔子家語》，不能說是和臭。其餘梁屈二人所舉之例亦未有不合中國句法之處。

4. 《產語》的文章水準高於日本漢文程度，更何況，《產語》全書兩萬多字，被當作和臭之例的字數則如此稀少，難以想像三十歲的春臺可以達到如此境界，這表示將《產語》作者判定為中國人較為恰當。

5. 從前澤淵月所記來看，徂徠在如此短時間又未讀畢全書、未交代根據的狀況下，所作的判斷也不過是輕率的結論而已，不足為據。金峰所作之序文，也不過是受到徂徠之斷言影響而已。此外，《產語》成於春臺三十歲時，《經濟錄》成於五十歲時，一為農家思想，一為儒家思想，大不相同。因此不能如金峰所言，將《產語》視作《經濟錄》之「緒餘」。若持「春臺偽作說」，則必須認為春臺即便偽作《產語》的舉動被識破，仍舊堅持在跋文中說謊並企圖流傳後世，這一點令人難以接受。因此春臺應當是不願傷及其師的權威，故不加辯駁，僅於跋文中留下真正的事實。

目前可見之神谷氏最後一本《產語》研究論著，是他將《產語》翻譯為現代日語，並附加其所據之原刻本影本而成的《產語—人間の生き方—》。[16]該書最前面一部分是對《產語》的說明以及先行研究。與上述論爭內容相較，並無值得注意的出入，也未提及新的學界反響。可見「春臺偽作說」的主流地位仍未變化。另外，臺日學界中沒有其他學者公然贊成「秦漢逸書說」，並提出具有學術性的論證，且神谷氏寫作計畫中所包含的《產語の研究》後四本終未發表。《產語》的相關論爭，因此在1971年暫時畫上休止符。

1971年後迄今，管見所及，有關《產語》的研究論著僅有永吉雅夫〈太宰春台と産語〉一篇。[17]該文的基本立場傾向「春臺偽作說」，對神谷氏進行質疑。永吉氏之文主要論點為：

1. 前澤淵月所提到的《產語》相關記載，其根據不詳，有待確認。

2. 《產語》中有一則子貢（前520-前446）與禽滑釐（約前390-前315）的對話（將於下文探討），就時代而言不可能為現實對話之記載，且頗有襲自《論

16 〔日〕神谷正男，《產語—人間の生き方—》（東京：明德出版社，1997）。該書初版時間為 1971 年 1 月，本文所據之版本為新版。新版所收序文撰作時間點為 1970 年，且書中並未談及 1970 年以後的學界研究，可知新舊版內容無異。

17 〔日〕永吉雅夫，〈太宰春台と産語〉，《追手門学院大学文学部紀要》第 23 期（1989 年 10 月），頁 301-3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語》處。另外，《產語》中有出自《孝經》、《說苑》之句。[18]《說苑》的成書年代上距先秦已晚，這表示《產語》著作時間不早於漢代。再考慮到如春臺跋文所言，《產語》「自漢以來，歷代〈藝文〉、〈經籍志〉皆不載」，若還視作中國著作，就顯得不自然了。

3. 《產語》雖然常引述孔子、子貢等儒家者言，但其中也提倡「無用」的概念（相關之處將於下文探討），因此乃是吸收道家思想而超越儒家的作品。

以上乃是《產語》先行研究的回顧，可以看到幾乎所有的爭論都圍繞著作者問題而展開。對此，筆者認為仍應以「春臺偽作說」為是。以下敘其理由。

（二）「春臺偽作說」較優之理由

目前為止有關《產語》作者的說法，如上所述，可分為「秦漢逸書說」、「春臺偽作說」，和介於兩者之間的「東晉前後逸書說」，而以前兩者為主。為清眉目，先將上述爭論內容之大要表列如下：

	秦漢逸書說	東晉前後逸書說	春臺偽作說
代表人物	神谷正男	黃得時、王叔岷	江戶時代以來之日本學界、梁容若、屈萬里
基本主張	《產語》為戰國末年至漢初之間的中國逸書	《產語》為東晉年代前後之中國逸書	《產語》出於太宰春臺之手，假託為中國古逸書
內容思想	該書不可能成於以朱子學為主流的德川社會，其內容為中國農家思想	未詳加探討	春臺個人思想
和臭問題	《產語》中無和臭表現，且並無證據顯示此為春臺會犯下的和臭。且被懷疑為和臭之處甚少，可證明非日本人所寫	未詳加探討	【梁】「甚口便捷」、「敢問治生何道之以」、「發政以制之」、「何不似有閨者甚也」為和臭 【屈】「敢問治生何道之以」、「何不似有閨者甚也」、「曾何鳥獸之若哉」、「竊為大王殆之」為和臭

18 可參考〔日〕神谷正男，《產語の研究　校注篇》，索引頁 13-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明代笑話之關係	未能證明中國原典傳至日本且為《產語》相近處之本事，兩者情節亦有出入，且不能以此否定其餘未詳說話的探討空間	未詳加探討	「梁人有畜貓者」明顯襲自《應諧錄》，可證明《產語》不早於明代
未詳說話	保留未載於古籍的大量戰國時人對話，有輯佚之價值	雖為東晉前後好事者所為，但可作考訂與校勘古書之用	為春臺所編造
徂徠之言	徂徠於短時間內所作之判斷當屬誤解，影響所及，導致春臺偽作說自江戶時代以來成為主流	未詳加探討	據此可知《產語》為春臺所作

在上一小節的先行研究介紹中，已可看到雙方都分別處理了《產語》內文字來源的考證問題，只是最終的結論大相逕庭。例如同樣一段出自中國典籍與《產語》的文字，既為此方援以主張《產語》襲中國典籍，又為彼方援以認定中國典籍襲《產語》保留之佚文。事實上這也表示光憑文字考證，尚無法徹底解決此問題。有關《產語》內容與中國典籍重合處的考證工作，雙方前賢已處理完畢，再加上要解決此問題，顯然需要新的切入點，故筆者擬就其他角度立論，說明若持「秦漢逸書說」乃至「東晉前後逸書說」，將會遭遇哪些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以及「春臺偽作說」如何回答神谷氏的質疑。

《產語》疑似上古文獻，卻在中國未曾被認識，而又飄洋過海至日本，這種情況發生的機率其實微乎其微。「秦漢逸書說」等於是翻案之舉，理當以較嚴格之眼光審視，不能見獵心喜。但神谷氏其實對不利於「秦漢逸書說」的理據要求較為嚴格，反之則較寬鬆。例如他從未試圖解釋《產語》傳至日本的時間點與可能性，卻以「找不到《應諧錄》傳到日本的記錄」為理由來反對梁屈二氏。若質疑《應諧錄》沒有傳至日本的記錄，為何不以同樣標準質疑《產語》呢？若主張傳至日本的中國書籍不見得會留下明文目錄，則對於《應諧錄》的質疑也可以說是無效的。這種態度容易造成方法論上的問題。

「秦漢逸書說」的根本要素有二：一、此書非太宰春臺或其他日本人所作；二、此書成於戰國末年至漢代初年之間。這兩點都是持「秦漢逸書說」者必須證明的，而非僅主張《產語》不似日本人手筆即可。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持「春臺偽作說」甚至「東晉前後逸書說」者，主要作法都是盡量找出《產語》所含的漢代以後之痕跡，來說明「秦漢逸書說」的不合理性。《產語》作為一個篇章順序已編輯完成的文獻而問世，若依「秦漢逸書說」，則各篇都應不晚於漢

臺灣占卜學術期刊資料庫

代。只要找到一兩個反例，自然足以動搖全體之有效性。

「梁人有畜貓者」與〈貓號〉的結構包含諸多共同要素，自然會讓人認為後者為前者之本事。為何不會是前者為本事呢？這是因為《產語》若為秦漢逸書，獨見於日本，於中國毫無任何記錄，則根本不可能為千年後的明代人所認識，亦不可能為笑話書之本事。若主張兩者無關，則難以解釋為何兩不相涉的作品會包含複雜的共同結構，除非完全託諸巧合（但這形同未予解釋）。在找不到獨立於兩者以外之本事來源的情況下，最合理的解釋便是「梁人有畜貓者」襲自〈貓號〉，故可據此認為《產語》不早於明代，摘瘤故事的部分亦同此理。此外，早在江戶時代初期，即已有大量的明版書籍輸入日本，內容豐富，對日本儒學也有刺激的作用。[19]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應諧錄》等笑話書成為日本儒者之素材，本屬合理。這一點也使得「春臺偽作說」遠較「秦漢逸書說」合理。

至於和臭問題，神谷氏主張需全面檢驗春臺乃至日本人所作之漢文，找到同樣的和臭之例，才能將《產語》中的相關處視為和臭。如果以春臺的和臭表現為研究主題，那麼這種做法確實較為妥當。但既然重點在於檢驗「《產語》為先秦逸書」此命題之真偽，則和臭的存在本身即可顯示不自然之處。畢竟《產語》與其他日本漢文的一大不同處，在於其被宣稱「為先秦時中國人所作」，那麼我們其實只要觀察上古漢語中有無這樣的表現，據之檢驗即可。

比較明顯的是「敢問治生何道之以？」這一例，[20]解讀為「用什麼方法來治生」。「何（NH）+NI+之（T）+V」的疑問句句式，在先秦文獻中並不罕見，然未有V處為「以」字並為句末之例。管見所及，尚未有明確論點證明此句式中V處之用字有何限制，但在找不到其他例子的情況下，「何道之以？」的用法自然大為可疑。而神谷氏僅提出此句之解讀方式，則缺乏解釋效力。若我們假設句末使用「之以」的用法已亡佚於中國，而保存於《產語》中，那這也不過只是孤證而已（何況出於此具有爭議性之文獻），缺乏應有的說服力。另外一種可能性是「何道之以？」句末脫一「也」字，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有其他版本的《產語》在該處並未脫字，故此說亦不甚穩固。

另外，神谷氏引《孔子家語》為「竊為大王殆之」一句辯護，但眾所皆知，《孔子家語》乃王肅（195-256）所偽作，不能視為先秦文獻。充其量只能藉此

19 可參考藍弘岳，〈「武國」的儒學——「文」在江戶前期的形象變化與其發展〉，《漢學研究》第 30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239-269。

20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文侯問第十》，頁 379：「文侯問於李悝曰：『夫子嘗言治生，寡人未聞其說，敢問治生何道之以？如寡人者，亦可以治生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明此句未必不合中國句法，但絕不能因此將《產語》之年代上溯至秦漢。至於其他例子，神谷氏僅認為其並無不合中國句法之處，但既然真正的目的是擁護「秦漢逸書說」，則在缺乏其他先秦文獻佐證的情況下，這樣的辯護並不成功。梁、屈二氏未對和臭判定之標準多加說明，也未試圖嚴謹地從日語結構去闡述這些句子的和臭表現原因，無怪乎神谷氏對他們的宣稱並不滿意。但真正合理的反駁方式，應該是確實找出先秦文獻，指出先例，表示其不僅合於中國句法，更合乎上古漢語之表現，方能無疑，這是神谷氏並未作到的。

筆者想再舉出一例：〈樂施第二〉中子貢與禽滑釐對談的寓言裡，以子貢的口吻援引孔子的治生相關之論。然而其中卻說「夫子嘗語曾子諸侯之孝」，[21]等於是讓子貢稱呼曾參為「曾子」，這不合中國之文例，更不合中國之文化。梁、屈二氏著重於《產語》和臭中的「和句」，至於此例則可謂「和習」，[22]若此書乃中國人所撰，應不致如此。

接著是與漢字有關的問題：若《產語》成立時間在《史記》之前，亡佚於漢，則其形態應非紙本而為簡帛，文字應非楷書而為篆隸。《產語》若東傳日本並於千餘年後現世，需要經歷一段識篆隸而轉為楷書的傳抄過程。[23]若如此，《產語》可說是日本漢字史上極為貴重的史料了，然而事實上，在春臺之前，日本方面完全沒有任何涉及《產語》的記錄。這也是不自然之處。

「秦漢逸書說」存在著上述種種不自然、難以解釋之處，故應當放棄之。對於《產語》中與《史記》、《漢書》有關的部分，也因此不需考慮是否有《史》《漢》本自《產語》的可能。[24]

---

21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樂施第二》，頁 343。

22 荻生徂徠曾於〈文戒〉中將和臭分為「和字」、「和句」、「和習」三者，曰：「和字者，謂以和訓誤字義者也……和句者，謂語理錯縱，失位置上下之則者也，亦緣此方顛倒迴環之讀而誤……和習者，謂既無和字，又非和句，而其語氣聲勢不純乎中華者也。」見江戶・荻生徂徠，《譬園隨筆・文戒》，〔日〕吉川幸次郎、丸山真男監修，《荻生徂徠全集》第 17 卷（東京：みすず書房，1976），頁 177-213。

23 春臺本人所撰之跋文及其他著作中，無涉及《產語》字體、形製方面的敘述。可以合理推測，江戶時代人所得見之《產語》本以楷書寫成。

24 《產語》與《史記》、《漢書》內容相關處，最重要者為李悝「盡地力」之教。〈有土第三〉借李悝之口，將「盡地力」解釋為善用天然資源而使國富饒。《史記・貨殖列傳》曾記載李悝有盡地力之教，然並無詳細解釋；至《漢書・食貨志》方有「盡地力」的進一步闡述，而主要內容則為重視農田產量（詳下文）。細讀可知，《產語》與《史》、《漢》之說其實差異甚大，若《史》、《漢》本自《產語》，當不致有此現象。

臺灣文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外，上述問題也使得「東晉前後逸書說」難以成立。「東晉前後逸書說」提出了一種新的可能性：此書仍成於中國人之手，而於中國亡佚，且因曾傳至日本而獨為日本所見，而春臺不察，遂謂其為管、晏、李、白之徒所作。但一來屈萬里已指出《產語》含有晚於東晉前後之詞語；二來「東晉前後逸書說」也無法解決上述的問題。況且若此書為中國好事之徒為之，所預設的讀者當為中國人，且至中國書籍有較大可能性傳至日本的隋唐時代為止，《產語》一書當尚能為人得見。為何在中國歷代史料中卻絲毫沒有任何顯示此書曾經存在的痕跡，卻又能在日本發現？或者我們可以假設《產語》成於明代中國人之手，但相對於「中國毫無《產語》曾經存在的痕跡」之歷史事實，這種假設顯得更加缺乏說服力。凡此種種，最合理的解釋便是「《產語》的作者並非中國人」。在經過上述思考，排除「秦漢逸書說」，乃至「《產語》作者為中國人」的可能性之後，我們很自然地便應將重點放在日本，以及身為「第一位發現者」的春臺身上。

如果說《產語》作者其實是春臺以外的日本人，那麼「在春臺以前無相關記載」這一點就啟人疑竇了。從金峰序文可知，江戶時代對《產語》的認識，即為此書乃春臺所作。金峰並未交代何以得知春臺即為《產語》作者，應本諸在此之前的學界通說。無論此通說是否來自徂徠的斷言，至少可知時人並不認為此書出於其他日本人之手。春臺弟子松崎觀海（1725-1775）的〈春臺先生行狀〉，也直接在記錄春臺著作時將《產語》列於其中。[25]而春臺跋文中說的「傳言出於寧樂佛寺之古藏」，也無從證實，更無從得知為何會流出至大阪市集。種種不自然之處，只能使人認為，春臺跋文中的敘述，並非出於他的誤判，而是偽書工作的一部分。

不過如此一來，便需要回應相關的疑問：為何其中沒有與春臺其他漢文中相同的和臭？以春臺的能力，是否能在三十歲時寫出《產語》這樣的漢文作品？

確實，上文論及的和臭之例，只能據之以推翻「秦漢逸書說」，不能當作「春臺偽作說」的最直接證據。然而，這方面的例證確實有助於我們判斷《產語》並非中國人所作，且不致於明確地否定「春臺偽作說」。畢竟，春臺並未於其他漢文中表現這樣的和臭，不代表它們絕不會出現於《產語》中。質疑《產語》中的和臭與春臺漢文中的和臭不一致，其實能夠說明的東西相當有限。既然和臭問題不能直接地否定「春臺偽作說」，那麼我們不妨存而不論，只要能

25 詳見江戶・松崎觀海，〈春臺先生行狀〉，收入江戶・太宰春臺，《春臺先生紫芝園稿》，〔日〕小島康敬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六卷（東京：ぺりかん社，1986），頁300-3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此辨明《產語》作者非中國人即可。

比較需要討論的問題是春臺在三十歲時，是否能寫出《產語》。此書作為日本漢文，確實具有一定水準，善用鋪排手法說理及塑造寓言，並非稚拙之作，少數的和臭之例亦瑕不掩瑜，持「春臺偽作說」者對此均不曾提出否定。此外，《產語》引用許多經書、戰國時代人事地物、先秦諸子之言，可見作者的經學、史學與子學造詣頗為可觀。這道門檻絕不下於該書所需之漢文作文能力，要能自由運用經史與子學資源來表述其經濟思想，絕非單純模擬古文便可辦到。三十歲甫入徂徠門下，經學用力未深的春臺，確實很難令人相信具有這樣的能力。

事實上，金峰序文和前澤淵月之記載，雖同為「春臺偽作說」的來源，但兩者之間卻互相衝突，不能視作彼此有相承關係。若依前者，則《產語》與《經濟錄》的撰作年代應較為接近，應將《產語》視為春臺五十多歲前後之作品；若依後者，則《產語》為春臺入徂徠門後不久所作，於三十歲時完成。認同「前澤氏之記載為真」，我們才需以三十歲的春臺能力去衡量寫下《產語》的可能性。但前澤氏記載究竟本於何處？這一點無從查考。此記載之可疑處有二：第一，前澤氏《太宰春台》出版於1920年，而江戶時代春臺弟子們有關《產語》的言論，均未提及徂徠讀《產語》之事。何以兩百年後的前澤氏可以獲知如此生動的場面？其根據究竟為何？第二，若採信前澤氏的記載，除了必須質疑春臺於三十歲時是否有如此造詣，同時也會招致上文所介紹的，神谷氏所指出的不自然之處：為何此後三十多年，春臺的其他作品中均未提及《產語》？為何春臺在被徂徠識破假造古書之後，仍堅持《產語》為中國逸書的說法？[26]

26 上文曾提到，神谷氏基於「秦漢逸書說」的立場，對這些不自然之處的解答是：在德川幕府尊朱子學的政策之下，春臺《產語》的思想可說是危險思想，故無法直接揭櫫於世；而面對徂徠的誤解，春臺身為學生，也不好反駁，只能在最後透過跋文來表達事實。筆者認為這些推論難以自圓其說。眾所皆知，江戶時代的尊朱子學風氣，並非從十七、八世紀即成為普遍而大規模的風潮。相反地，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的古學思想一出，即大行其道，流佈天下，其聲勢比起朱子學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我們不能將1790年「寬政異學之禁」以後的朱子學地位套用到春臺的社會中，亦不能因此說《產語》是危險思想。更何況，《產語》內容未含反朱子學之處，且與《經濟錄》內容相通（詳下文）。若《產語》不見容於世，《經濟錄》豈能倖免？另外，關於春臺尊師問題，其實〈春臺先生行狀〉已記載：「先生與徂來講論不合，必再三爭辨，弗明弗措。」見江戶．松崎觀海，〈春臺先生行狀〉，收入江戶．太宰春臺，《春臺先生紫芝園稿》，〔日〕小島康敬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六卷，頁301。又根據江戶．原念齋（1774-1820），《先哲叢談》（東京：有朋堂書店，1929）記載，春臺嘗自述：「蓋先生之志在進取，故其取人以才，不以德行，二三門生亦習聞其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永吉氏在討論《產語》作者問題，面對金峰序文與前澤氏說法的衝突時，因不知後者根據為何而選擇放棄之。筆者認為這個作法較為妥當，連帶地我們也應該放棄春臺於三十歲時作《產語》的可能性，而應將之視為學問成熟、五十多歲時之作。〈春臺先生行狀〉對於春臺學問大成之後的描述提到：

> 先生為學，夙夜黽俛，終食之外，手未嘗釋卷。天下之書無不讀，天下之事無不通。其義出於經傳，事涉子史，上下數千載，歷歷如視諸掌者……秦漢以至元明，制度法律、 天朝文獻、國朝沿革……食貨諸物貴賤輕重、五方所尚，其所以平價通利之方，皆循循言之有序……嘗與門人論鹽政，語天和以後至今時鹽價，不有遺漏。因問他物，亦各從語其價。[27]

即便〈行狀〉可能有溢美之處，也可從中窺知春臺時時留心於各種外王事功之學所需之知識，更能解釋春臺據以撰作《經濟錄》的背景知識。以此時的春臺能力衡量其寫出《產語》的可能性，並無任何不合理之處。最後一個問題，也是神谷氏曾質疑的：曾批評古文辭學派擬古風氣為「糞雜衣」的春臺，如何可能又以擬古手法寫書呢？

回到「糞雜衣」一詞的出處，也就是春臺的〈文論二〉，其中確實提到「今吾黨學者……觀其為文，乃抄古人成語，而聯綴之而已。文理不屬，意義不通……若此之類，吾嘗戲目之為糞雜衣」，[28]但綜觀《春臺先生紫芝園稿》所收七篇〈文論〉，可知他反對的是古文辭學派於擬古時，因執著於套用古句古字，使文章喪失文理，又混用不同朝代之句，並誤以為襲用成語即為擬古，也就是反對學者在操作上之不當，並非反對古文辭擬古意圖之本身。例如他抨擊因擬古不當而產生弊病的明代後七子乃至江戶時代古文辭派末流，[29]但同時也肯定無

不屑德行，唯文學是稱。是以徂徠之門，多跅弛之士。及其成才也，特不過文人而已，其教然也。外人既以是譏先生，純亦嘗竊不滿先生，此先生之所以雞肋視純也。」（頁 390-391）可見以春臺個性，不會有因顧及師生地位差異而沉默之事，其與徂徠之間絕非單純之上下服從關係。

27 江戶．松崎觀海，〈春臺先生行狀〉，收入江戶．太宰春臺，《春臺先生紫芝園稿》，〔日〕小島康敬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六卷，頁 302。

28 江戶．太宰春臺，〈文論二〉，《春臺先生紫芝園稿》，〔日〕小島康敬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六卷，頁 169。

29 「如明諸子，孰謂不工？然其病在用古人成語……如于鱗擬秦昭王書，雖人所稱，予不悅之也。至若王元美《左逸》《短長》，雖巧思出于鱗擬書之右，亦自一二成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些弊病的擬古為文之法：

> 嗟夫！今人生于千載之下，屬文而擇古辭，為法固善，先儒之教可仰。然至其末流，迺用套語，則亦為法之弊迺爾。[30]

> 為文者要在了古法，法在字句篇章。故今之作者，立言行辭，苟取法於古人，而步趨不失矩矱，則雖言古人所未始言可矣。[31]

這才是春臺對於為文之法的真正態度，其所斥者乃人病而非法病，因此不能斷章取義，也不能僅以「糞雜衣」之語否定春臺擬古而作《產語》的可能性。更何況，《春臺先生紫芝園稿》中，收有「風雅」一類，乃春臺擬《詩經》句法之詩作，已可為其不反擬古之證。[32]

綜上所述，我們可對《產語》作者問題作如下結論：

1. 《產語》為太宰春臺假托中國逸書而成的擬古之作，據金峰序文可知，其意在寄託經濟思想，成書時間接近《經濟錄》撰作之時。春臺的擬古材料主要為至漢代為止的經、史、子典籍，並受到明代笑話書影響。

2. 書中所有未詳說話，均出於春臺擬古編造而為。至於冒頭注文部分，則有兩種可能：其一乃《產語》不同版本傳鈔過程中，校對者所留下；其二為春臺本人為求仿造古書之逼真程度而作。無論如何都與中國無關。

釐清了作者問題後，以下將探討《產語》之內在思想。

三、《產語》的思想結構

《產語》雖流傳至今，但或許是因為學界對春臺經濟思想的研究，都集中在《經濟錄》，導致此書內容未引起較多的探討。上一節所列舉的日本與臺灣

破綻，惜哉……李、王尚以是取敗，況其他乎？」見江戶．太宰春臺，〈文論四〉，《春臺先生紫芝園稿》，〔日〕小島康敬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六卷，頁 173。

30 江戶．太宰春臺，〈文論三〉，《春臺先生紫芝園稿》，〔日〕小島康敬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六卷，頁 172。

31 江戶．太宰春臺，〈文論四〉，《春臺先生紫芝園稿》，〔日〕小島康敬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六卷，頁 173。

32 江戶．太宰春臺，《春臺先生紫芝園稿》，〔日〕小島康敬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界之論著，已為目前可見之《產語》先行研究之全幅。而先行研究除了神谷氏和永吉氏對《產語》學派歸屬問題略作申論之外，其他皆未深入論及《產語》思想內容。且因神谷氏與永吉氏論著的絕大篇幅都集中於作者考證問題上，故即便連學派歸屬之論證也較為簡短。因此可以說，《產語》的思想內容仍然是一個有待闡明的研究課題。故筆者不揣淺陋，試作分析，並將於其後對神谷氏和永吉氏的說法提出回應。

《產語》全書皆環繞「治生之道」而展開，既論個人所應有之作為，又論政府所應為之政策，意在對社會經濟全體進行宏觀與微觀之論述。以下，分別就核心思想、重要原則，以及具體的操作實踐、國家政策這兩個部分，來觀察《產語》的內涵，並適時搭配《經濟錄》內容一併說明。

（一）《產語》的治生原則

春臺於書中亟言治生之重要性，他從人類生存最基本的欲望及所需處立論，認為：

> 人之所須，莫先於衣食。一日不治生，雖未見其損，積之則必有一日饑寒。若知一日饑寒之不可忍，何可以一日不治生乎？是故天子以萬機治生，諸侯以一國政事治生，大夫以其官職治生，自士以下，各以其事治生。庶人之業，農工商賈，皆所以治生也。[33]

也就是說，治生關係到個人生存之維繫，乃人生在世，不分階層所應為之事。除此之外，春臺更強調治生之必要乃基於道德義務，說：

> 稷丘丈人語其子曰：「……若曹生為人矣……豈欲無事而食，與鰥寡孤獨廢疾者為伍與？丈夫之恥，莫大乎游食；男子之事，莫先乎治生，若曹勉哉。」[34]

> 人有天祿，治生之謂也……人苟有天祿，而弗能畜人，亦弗能自養，

第六卷，頁 25-26、90-91。

33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鳥穀第一》，頁 336。

34 同上註，頁 3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斯之謂竊天祿。竊天祿者，天誅不可逭也。[35]

可以看到治生之道德義務涵蓋兩個意義：其一為整體社會運作中，其中一人尸位素餐，即等於毫無生產力而又消耗資源，對他人造成負擔，必須抨擊。這是從後天社會合作之必要性來說；其二為宣稱人先天即有履行自身社會角色所包含的生產工作之義務。「天祿」一詞於《尚書》、《孟子》、《左傳》等先秦文獻中可見，大致上皆指所獲得的上天庇佑，而能藉此立身。春臺在此則以之為治生義務之來源，認為人生於世，此「存在」之狀態即獲天祿而成，故需致力於自養養人的治生之道，方能不負天祿，避免引發「悖天地之德」的種種飢餓乃至動亂之後果。

治生是為了避免窮困，而不代表必定能免於窮困。春臺亦曉此理，而對貧窮的現實狀況作出如下論述：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至哉斯言也……古之君子，忘窮忘達忘通忘塞，忘忘窮達通塞，忘忘其忘，止焉者，並與君子之道忘之，渾渾然與天同運，與地同處，與萬物偕化，盛哉德乎……荀卿曰：「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36]

此處引用《論語》和《荀子》等儒家文獻，表達「義命對揚」的儒家修身思想；而中間頗似道家玄言的句子，又可令人聯想到《莊子‧天地》所說的「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37]呈現出忘自身之成心而順應自然的解脫之道。兩者並觀，可見春臺要表達的是面對窮困，亦應以超越的心態看待，不因此忽略自身的治生義務。「道」在此雖為關鍵字，但《產語》主旨不在於引導人們追求冥契經驗，或以審美之眼光開顯自身及萬物之存有根源，故不宜純粹以《莊子》思想解讀此段，而需將之作為「義命對揚」論述之輔翼。總而言之，春臺雜用儒道兩家之言，強調的是治生之義務不會隨貧窮與否而改變，重要的是持續地實踐之而不動搖。

春臺所提倡的治生之道，首重節儉。〈樂施第二〉云：

35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有土第三》，頁 345-346。
36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有人第五》，頁 354。
37 據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7），頁 4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節也者，為之限也。竹有節而不可越，木有節而不可折。節也者，止焉而不得過之謂也。是故有國有家者，必知節用，而後可以行仁義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之義大矣哉。」[38]

這裡發揮《周易・節卦・彖傳》之義理，主張節儉為保持財產之所需，強調其重要性。此外，同一篇中載有兩則寓言，分別為子貢與禽滑釐和公孫克的對話，皆以子貢之口表達節儉對治生的重要性。其中提到：

> 昔賜問政於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吾是以知政自足食始也。夫子嘗言道國曰「節用而愛人」。齊景公問政於夫子，曰「政在節財」。夫子嘗語曾子諸侯之孝曰「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其言庶人之孝則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吾是以知節之為道，其利博也。[39]

子貢為孔門之富裕者，春臺以其為寓言主角，蓋著眼於此。此段提到四則孔子之言，分別出自《論語》、《韓非子》和《孝經》，但值得注意的是，原文重點均不在於強調節儉而使民富裕，或至少不在於以此為唯一的首要之教。春臺在此則轉化引用之，為的是援用古人之言以提高說服力，並更切合自身的擬古作法。而我們則可以明顯看到春臺所言的治生原則，係以節儉為依歸。如此，財富方能謹守不失，可長可久。

另一方面，也不可因過度節儉而變質為吝嗇。春臺在〈馮驩第八〉中重述馮驩於薛地為孟嘗君（？-前279）市義的故事，並說：「聚貨者，怨之府也；施惠者，德之基也。君子積而能散，施而不德，不專其富，必與人共，不獨享其福，必遺子孫。」[40]表示重視慷慨濟貧的作為。除此之外，〈琴乙第四〉全篇為同一寓言故事，敘述貧者琴乙聽聞富人竇叔家財萬貫，門庭若市，故前往請教治生之道。竇叔的回答中提到：

38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樂施第二》，頁 340。
39 同上註，頁 343。
40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馮驩第八》，頁 3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保富有道，勿耽聲色，勿媺衣食，勿飾宮室，勿樂佚遊，勿近玩好，勿觀博弈，勿嗜酒，勿招客，勿妄予，勿妄貸，勿聞禮義之譚，勿悅仁人之言，夫然後可以保其富也。[41]

雖然竇叔也極力強調節儉之要，但最後卻流於吝嗇。「勿聞禮義之譚，勿悅仁人之言」也代表摒棄樂善好施之舉，喪失仁德之心。一味強調節儉以治生，確實有可能導致此結果。對此，琴乙反駁說：

> 有貨而弗用，藏而弗出，則如無貨。必若主君之所云，則是富之與貧，無以異也……今主君命僕，勿聞仁厚禮義之言，始僕之問於主君也，以求成人也；及聞主君之言也，殆且害人者也，僕不敢從。[42]

春臺不欲人們因過度節儉而扭曲為吝嗇，在此指出不花錢則雖富而貧，且喪失仁心，不過是害人之舉。與其吝嗇而富，不如安貧樂道。從中也可窺見，春臺理想中的社會是人們努力治生累積財富，而富者願意濟貧扶弱。不管是談論治生之義務還是財富的流通，春臺始終將「人」置於一個彼此合作的社會中，強調一個有機的經濟體。仁厚禮義等德行，具有支撐此合作關係的作用，故為春臺所重。

除了節儉之外，另一重要原則為儲蓄。〈有人第五〉中提到：

> 人知無用之用，然後可與言治生也。夫知治生者，能取無用於有用之餘，存有事於無事之中者也……善治生者，於衣食宮室之中，常存其無用，以待有用，所以臨事亡匱也。是故勤動趨事，治生之大本也；量入以為出，守產之大經也；存贏餘以備不虞，通變之道也。[43]

「無用之用」是《莊子‧人間世》和〈外物〉兩篇中有名的概念，春臺借用之而大幅轉化，指「並未馬上使用」之物為「無用」，宣稱其用在於備不時之需，此即倡言儲蓄的重要，並視之為治生的必要方式。這一段也總結了《產語》談

41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琴乙第四》，頁 352。
42 同上註，頁 353。
43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有人第五》，頁 357-3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治生原則的三個重點：生產、節儉與儲蓄。就個人治生的層次來說，《產語》所言實可以此三點來把握。

至於為政者的治生，也就是治國的層次，其原則亦大致相同。首先在「節儉」部分，為政者須戒除個人逸樂，避免不必要的花費，累積資源。在〈有人第五〉中有相關論述：

> 人身邪氣實，則正氣為之虛。醫者洩其實，補其虛，邪氣去，正氣復，其人乃安……穀粟貨財者，國之正氣也；穀粟貨財匱于國，是正氣虛也。穀粟貨財之所以匱于國者，其君縱欲，而諛臣濟之也……故既洩其所洩，補其所補，然後任賢使能，事尚儉素，崇孝弟，興禮樂，是乃調理國家也。[44]

妨礙治國的首要因素為君主之縱欲，若能戒除之，並提倡節儉之風，方能使國家富裕，是謂治國之正道。此外，為政者節儉的另一種表現是不藉由外在事物炫富。〈冷無疆第七〉提到：

> 天子之富在百姓，國君之富在軍旅，卿大夫之富在門庭，士之富在室家，庶人之富在衣食。故富之所在，君子所用力也。富非其所者，君子醜之。夫人靡不欲富，而得之有命，致之有道，用之有義。夫外內皆富者，蔑以加焉。若不然，與其外富而內不富也，寧外不富而內富。[45]

為政者富裕的表徵，不在於自身使用多麼華麗高級的器物，而在於其所轄之人是否衣食無虞，否則不過只是享用非自身所生產之財富，流為聚斂而已，絕非治國之方。基於同樣的道理，春臺又引述《韓詩外傳》曾提及的公子晏與晉平公之故事。該故事描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失，公子晏卻表示道賀，理由是：

> 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於篋櫃。今百姓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君收大半而藏諸臺，是以天火之。

44 同上註，頁 356-357。

45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冷無疆第七》，頁 366-3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今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臣恐君之為鄰國笑矣。[46]

這裡充分表達出為政者應自持儉素，藏富於民，不可聚斂以助其豪奢的思想。春臺在引述這則故事之後，說：「荀子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公子晏其達於斯乎。」[47]從中可以看到春臺善用中國古籍來強化自身論述的能力，更可以看到對節儉的重視正是春臺治生思想的關鍵要素，以至於他反覆強調之，並用來貫串個人與治國這兩種層面。

至於另一要素「儲蓄」，春臺則是發揮「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的觀念來論述之。此觀念可見於漢初思想，例如《禮記‧王制》云冢宰制國用時說：「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48]《淮南子‧主術》亦云：「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閔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49]要言之，皆在於表達為政者須保持儲蓄，使國有餘糧，以備天災之患時人民能免於飢餓。春臺吸收此思想，創造了魏文侯與李悝對話的寓言，說：

> 魏文問於李悝曰：「寡人聞之，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何謂也？」李悝對曰：「凡制國用，四分一歲之入，而食其三，餘其一。積三年所餘，得一年之食，以為蓄積……若有幸而久無數者患，然軍旅征役，國家時有。苟非倉有餘粟，府有餘財，何以供其費用？……故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豈不殆哉？」[50]

46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良卜第十二》，頁 389。

47 同上註。

48 據清．阮元，《禮記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五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頁 238。

49 據漢．劉安編，高誘註，《淮南子》（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 257。

50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有土第三》，頁 346-3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裡襲用《禮記》文字的痕跡非常明顯，對「餘一年之食」的解釋也大致依據《禮記正義》。正如同個人治生，需知「無用之用」一般，為政者治國也需考慮如何使「倉有餘粟，府有餘財」，而長治久安，真正達到國家層次的治生目標。

（二）《產語》的經濟政策

最後有關國家層次之治生的「生產」部分，涉及許多具體操作的技術，表現在《產語》所主張的經濟政策中。在個人層次上，「生產」此一要素只需個人克盡其職責即可達致；在國家層次上，實際的生產者是人民，為政者需要作的便是制定妥善的經濟政策以安排人民秩序，進而使國家富裕。

就這部分而言，最有力的途徑是盡量提高生產量，使人人皆能為自己創造財富，不為衣食與賦稅所困，國家便能富強。上文提到春臺論述個人治生義務時，從社會整體合作的角度著手，抨擊破壞合作關係的尸位素餐之人。這一方面也是因為，唯有落實人盡其職的整體合作模式，才能完成國家層次的「生產」。因此《產語》提到：

> 勞心者為君子，勞力者為小人，是其所勞雖殊，自予觀之，皆所以治生也。是故治生之事，夫人可為也，曷為擇乎？且人心不同，所向殊方……是故古之善為國者，俾四民各殊其處，以絕夫外慕之心，使其不見異物而遷焉，則管仲之治齊是已。心壹則其業就，心貳則其業不就，此四民之所同也。[51]

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對比，脫胎自《孟子・滕文公上》的文句。可以看到春臺和孟子一樣，強調社會階層分工的重要性。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善用各人的長處，達致整體的最大產量，並使社會的各項所需盡無遺漏。但同時我們也可看到，春臺很快地將重點拓展到「各殊其處」，反對人民因轉業而減耗生產，這或許是因為受到《管子》影響所致。《管子・小匡》藉管仲與齊桓公之對話，說：「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呫，其事亂。」[52]此處《管子》作者主張應使四民所居分離，各傳其業，讓他們「旦昔從事於此，

51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皐賓第六》，頁 360-362。

52 先秦・管仲著，江戶・安井息軒纂詁，《管子纂詁》（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卷 8，頁 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53]而春臺的理由較《管子》更為詳細。所謂的「其事亂」，就春臺思想來看，可解釋為人們見異思遷，以為其他行業較能獲利，造成其罔顧自身性向，終至無所成事，也使得社會整體分工合作模式崩潰。侯家駒（1928-2007）曾以現代經濟學的角度，詮釋《管子》分工思想之由，說：

> 因為競爭市場之長期均衡，是經濟利潤等於零，所謂經濟利潤乃是賺款淨額（或會計利潤）減投資機會成本之餘額。而投資機會成本是指此項資金可在任何其他地方賺得的最高報酬，是以，零經濟利潤是意謂各行業會計利潤相等，否則，某一行業經濟利潤大於零，是必蜂湧而至，如此，該行業因從業者多，競爭激烈，經濟利潤大降，甚至為負值，而他業則經濟利潤較高。最後均衡時，各業賺款相等……在此情況下，人民選擇任何一種行業，其賺款淨額或所得是均等的。[54]

這種解釋說明了為何有必要維持穩定的分工合作體系，除了可說明《管子》思想外，與《產語》所言亦可互通。

除了建立穩定的社會整體分工合作模式之外，也必須盡可能地利用天然資源以維繫生產鏈。上文曾略為談到，春臺發揮《史記》、《漢書》中記載的李悝「盡地力」之說，而代之以新解。他藉李悝之口說：

> 所謂盡地力者，使地無遺利之謂也。夫地者，五土之大名也。何謂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故知盡地力者，率其土性，不害所生，不疆所無，務贍民之衣食，利國之財用，然後有與無交易，饒與乏均分，彼此皆得其利，無有憾者。[55]

53 同上註。

54 侯家駒，《先秦法家統制經濟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頁40-41。

55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有土第三》，頁348-3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土之分，出自《周禮‧地官司徒》，與《漢書》所記載的「盡地力」之說毫無關聯。[56]春臺則將兩者結合，強調盡量善用各地不同的天然資源，並使彼此互通有無，以滿足人們的生存需要。如此便可盡量提高生產量，亦可使各地皆得其惠。此「盡地力」思想甚為春臺所重，他在《經濟錄》中亦大加宣揚：

> 所謂五土，見於《周禮》，一山林，二川澤，三丘陵，四墳衍，五原濕（按：當作「隰」）也……昔於異國，魏王之臣李悝者，立盡地力之道，行此於魏國，大富國也……近世如津和野侯大夫多湖子，造半紙而富國，可謂能盡地力者也。其後觀水戶義公之治水戶，見其知盡地力。此外未曾多聞。[57]

誠如上述，李悝「盡地力」之說與五土之關連，事實上全係春臺所建構。他在《經濟錄》和《產語》中堅持此說，除了尋求來自中國經典的權威性之外，也是因為此思想在他對於國家層次之生產的論述中，可謂一大支柱。

不過這樣的理想需要更多技術性的支持，來確保其落實於社會中。因此春臺主張「重農抑商」及「平準」兩方面的政策，以消彌阻礙生產的因素，真正達成藏富於民的目標。

第一級產業提供人們生存所需的直接資源，其重要性不在話下。春臺於〈文侯問第十〉借李悝之口而說：

> 天下之人，知金玉之為貴而已。夫人之患，莫急於饑寒……夫金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為物雖貴，無用於饑寒，是何足貴哉？……故賢聖之君，必貴五穀而賤金玉，貴五穀在尊農夫，賤金玉在卑商人……今不肖之君，賤穀而貴貨。貴貨故商人兼并農人，賤穀故農

56 「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據漢‧班固，《漢書‧食貨志上》（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1124。

57 江戶‧太宰春臺，《經濟錄》，《日本教育思想大系》第 15 冊，《徂徠學派》（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79），卷 5，頁 117-119。本文所引之《經濟錄》內容，皆係筆者譯為中文，下不另註。且以下為避繁瑣，省略書目全名，僅標示頁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流亡，此危亂之由也。[58]

農人所生產的糧食可供人生存，是最直接的財富；貨幣、珠寶等等則缺乏實用性，其價值建立在承平時期而已，並非恆定。但人們看不清這一點，故造成穀賤貨貴的狀況，導致農民獲利不高，土地容易被商人兼併。且因農人獲利遠不如商人，以致產業人口失衡，社會之整體合作終不可得。在此，「重農抑商」便成為重要的政策方向。

我們可以看到，春臺雖然肯定社會上各行業各階層的重要性，但在他看來，商人最容易破壞社會的穩定性，是需要壓抑的對象。春臺在論及士農工商四民之地位時又提到：

> 農之為事也，耕耘樹藝，不避寒暑，終歲勤勞，莫敢怠慢。及秋成之日，出什一以奉上，而食其餘利。用力多而得利少，故次貴……商賈壹以智射機利者也，故一日或得數倍之利，不必用力而得利常多，所以最賤也……古先聖王之所以道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59]

商人對社會的危害，在於其充滿投機心態，本身無實際生產，卻能獲利數倍於農人，容易敗壞風氣，故不能不壓抑之。這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法家抑商的一些言論。誠如李達嘉所指出，中國抑商論奠基於《韓非子・五蠹》和《呂氏春秋・上農》，歷代抑商思想主要以此為依據。[60]而《產語》的這段文字最後部分，正是襲自《呂氏春秋・上農》，影響關係十分明顯。另外在〈馮驩第八〉處，甚至將《管子・治國》整篇引用，足見其對該篇思想的認同。〈治國〉內容重點在於「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事農」，春臺引用此篇，用意正在於宣揚重農抑商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重農抑商思想在《管子》並非貫串全書的要素。《管子》

58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文侯問第十》，頁 380-381。

59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四民第九》，頁 374-375。

60 李達嘉，〈從抑商到重商：思想與政策的考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2 期（2013 年 12 月），頁 1-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非成於一人一時一地之手，故其中的思想面貌亦甚複雜，例如〈侈靡〉篇便大談以鼓勵奢侈品來刺激商業，帶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乃至於認為「事末作而民興之，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賤粟米而敬珠玉，好禮樂而賤事業，本之始也」，[61]重商甚於重農，與〈治國〉篇可謂分佔光譜兩端，此即不為春臺所取。春臺去此取彼，正是因為他選擇了一條要求所有人融入社會整體分工合作機制的路，強調所有人需共同進行生產，反對尸位素餐，造成他人負擔。商人的獲利不靠第一級產業的生產行為，容易付出極少勞動而賺取極高收入，雖風險大，但獲利也大，使其他人心志動搖，終至產業失衡。春臺對個人生產義務的想法，決定了他在政策上對重農抑商思想的靠攏。

商人容易藉由操弄物價的方式牟取暴利，並使農民利潤微薄。因此春臺主張首先需保障農民生活，擁有基本利潤。他於〈四民第九〉引《管子・輕重甲》的「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饑……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塗不可獨行……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以及〈禁藏〉篇的「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62]其後自編白圭與齊王對話之寓言，借白圭之口說：「夫民之事，莫艱乎農，利莫薄乎農，故明君之愛民也，必先利農，於商賈則平其政而已矣。」[63]這些表現充分顯示出他對保障農民的強調。

最為春臺所重的政策，是由政府控制物價，以絕商人操弄。這部分集中在〈文侯問第十〉、〈物價第十一〉兩篇，也是《產語》論治生政策的重點所在。他主張，使糧食價格平穩，讓農民利潤不受影響，方為國家整體利益所在：

> 守國之要，在於蓄粟，蓄粟在於貴穀……今者自邦君以下，貴貨而賤穀，民視粟如土芥，舍旦暮所食，其餘盡以易貨，舉國之粟藏在商家，商人逐利，豈為國家計哉？……貴不害工商，賤不害士農，是為平價，價平而四民安。然必上下知貴穀，而後其價可得而平也。[64]

農民利潤有相當的部分來自穀價，故保障農民的具體措施必涉及於此。為避免商人透過囤積而尋求暴利，嚴重影響農民利潤與國家財政，必須由政府主動控

61 據江戶・安井息軒纂詁，《管子纂詁》，卷 12，頁 2。
62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四民第九》，頁 376-377。
63 同上註，頁 378。
64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文侯問第十》，頁 3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制價格，不使劇烈波動。春臺又說：

> 輕重貨物，而低昂其價，謂之利權。利權在上，則物之輕重，唯上所為，商賈未如之何；利權在下，則商賈競牟其利，上亦未如之何……今也上失其政，而輕重之權在下，是以諸物之價，乍貴乍賤，低昂無常，損益反掌。於斯之時，唯商賈占其利，而它多被害。[65]

這邊雖然談到「諸物」，但縱觀《產語》全書主旨，可知指的主要是糧食。此段更清楚地表示，完全由商人操弄價格的市場，將只有商人靠大量買進賣出而得利，財富過度集中，包括政府在內的其餘人皆無力與之抗衡，形成巨大的不平等。因此統一控制物價有其必要。他又大量引用〈輕重甲〉的「粟重而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價」一段，來作為具體操作之例，[66]而將之化用為管仲與齊桓公對話的寓言，可見他非常贊成《管子》中包含的中央管制之經濟政策，也就是「輕重之術」。

《管子》中涉及由政府管控糧價之主張，而又為《產語》所引用者，還有〈國蓄〉、〈揆度〉兩篇。例如〈物價第十一〉篇末又直接引用〈國蓄〉所說的「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以及〈揆度〉篇的「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67]皆基於同樣思想而引用之。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是〈文侯問第十〉，在引用了〈國蓄〉「夫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也」一段之後，春臺特別加入以下這一段話，而同樣借用管仲之口說出：

> 夫所謂君之利者，非上擅其利之謂也，以民利為利之謂也。夫君者，父母也；民者，子也，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且利，人之所同欲也。小人之好利甚於君子，如不先利民，而上之人務自利，則民怨其上如讐敵，君焉得獨享其利乎？是故利國莫若利民，利民必自農

65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物價第十一》，頁 384-386。
66 同上註，頁 386。
67 同上註，頁 3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始。[68]

這裡表示，春臺亦不欲人們將控制物價而獲利的「利」誤解為政府與民爭利，而是強調此乃維繫社會體系所必需的公共利益，也是重農抑商的終極目的。這也等於規定了為政者的義務，並從客觀的「人之所同欲也」觀點立論，具有說服力。春臺於《經濟錄》中強調「凡論經濟者，須知四事：一為知時，二為知理，三為知勢，四為知人情」，[69]從《產語》此段可見其如何呈現「知人情」之要。[70]

以上為《產語》思想結構的大致梳理。總而言之，《產語》全書揭櫫「治生」，也就是經濟活動的重要性，以此貫串各篇，而分論個人與政府在經濟治理上應有的作為，以追求國家整體的富強。從該書主旨，可以很明確地看出春臺所屬的徂徠學派重視事功、制度的一面。不過由於《產語》之思想學派問題，在先行研究中有不同說法，故在此仍須略作探討。

經過作者問題辨析後，其實該書學派問題也等同於「春臺在其中表現的思想屬於何派」。神谷氏所主張的農家說是無法成立的，因為正如孟子在反對許行的農家思想時所主張的一樣，《產語》提倡一種以四民說為基礎，而擴及至各行各業的分工合作之社會觀，而非認為所有人皆需並耕而食，從中更看不到「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這種極端忽視商品價值差異的想法。因此《產語》與農家思想並無關係。[71]至於永吉氏主張的道家說亦明顯不可從。因為如上文

68 江戶・太宰春臺，《產語・文侯問第十》，頁 382-383。

69 江戶・太宰春臺，《經濟錄》，卷 1，頁 21-22。

70 更明顯的對照處是春臺曾說：「禮義縱為人須守之道，饑寒逼身，則忘禮義，人之常也。管仲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孟子言『無恆產因無恆心』……守此禮義廉恥，乃人民不乏衣食，自上至下皆克盡其業，不缺其用後之事也。」見江戶・太宰春臺，《經濟錄》，卷 5，頁 113。

71 以江戶時代思想家而言，比起春臺，安藤昌益（1703-1762）的思想更容易讓人聯想到農家。昌益所提倡者為「直耕」：「此穀只為人食也，是轉定活真，直耕也……穀人、四類、草木生成，活真直耕矣……故人活真通氣，直耕食衣備也。活真橫氣，回生四類，四類大小互食，乃互性直耕也。活真逆氣，回生草木，草木時逆氣，乃草木直耕也。直耕食衣各也，食衣直耕各也。故轉定人物，食衣一道盡極矣，其外道絕無矣。」見江戶・安藤昌益，《自然真營道・大序》，收入安藤昌益研究會編，《安藤昌益全集》第 17 冊（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1995），頁 21-22。簡而言之，「直耕」意指產生生命。在昌益的世界觀中，萬物乃處於一生生不息、無始無終的運動過程中，且皆有產生生命的機能。人的「直耕」即為農業生產，故昌益主張所有人

臺灣本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析論的，《產語》中的「無用」內容絕不等於其在《莊子》脈絡下的意義，難以據此謂其吸收道家思想。筆者認為，正如春臺跋文所言的「儒家邪？抑法家邪？」，《產語》思想主要以此兩家為重。基於擬古作法，書中運用的中國思想文獻以先秦為主。而先秦儒家對經濟政策亦頗有留心之處，亦不避談商業行為、治生之道。誠如余英時在〈商業文化與中國傳統〉一文中所指出，早期儒家比其他學派更看重市場的重要性，並不主張重農抑商。法家則站在敵視商人、主張對市場完全控制的一端。[72]我們可以看到法家這種思想在《產語》中的地位甚重，不容忽視。而筆者認為，春臺本身為儒者，[73]儒法二家在此仍有本末之別。書中運用法家思想處在於操作物價以重農抑商的具體技術；至於治生義務之論述，也就是其社會觀所展現的核心價值，仍舊以儒家道德思想為依歸，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琴乙第四〉表達勿因執著於治生而妨礙仁厚禮義之教化、〈有人第五〉提到「崇孝弟，興禮樂」、〈馮驩第八〉讚揚佈施，乃至書中處處可見的民本思想，皆反映儒家思想在書中的地位。來自法家思想的論述，也是為了保障這種民本思想落實的手段。因此，可以說《產語》以儒家思想為主，而吸收法家的經濟思想以為技術上的輔翼。

皆需親自生產具體之衣食，並反對一切階級與制度，甚至任何人為的社會機制與技術，抨擊不直接生產者為「不耕盜食」(《自然真營道．大序》，頁 34)。丸山真男（1914-1996）認為，徂徠學派反對朱子學，而重視人為制度的思想，是「從自然到作為」；昌益則經由反對一切制度與階級，又從「作為」進入與朱子學不同的「自然」，見〔日〕丸山真男，〈近世日本政治思想における「自然」と「作為」〉，《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 年)，頁 252-265。依此類型對照之分析，我們也可看到春臺之重農，係以封建與經濟秩序維繫為宗旨；昌益之重農，則重在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自然回歸。這更鮮明地顯現出不可以春臺重農而謂《產語》屬農家。

72 余英時，〈商業文化與中國傳統——中國歷史上商人文化演變研究〉，余英時著，程嫩生、羅群等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323-385。

73「先生學吹笛於大神景豐，日光王好樂……欲召見先生……先生曰：『某，儒者也。王若命以文學之事，敢不謹述所聞？若奏薄技以供其燕樂，某不能也。如有復我者，吾其破笛，終身不復操音矣。』」見江戶．松崎觀海，〈春臺先生行狀〉，收入江戶．太宰春臺，《春臺先生紫芝園稿》，〔日〕小島康敬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六卷，頁 3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從江戶時代社會看《產語》

探討完《產語》內容後，必須將該書放在江戶社會的視角下來作進一步觀察。春臺的活躍年代主要為元祿（1688-1703）到享保（1716-1735）這段期間，江戶時代社會至此出現重要轉變：商業發展的興盛，以及貨幣經濟的龐大規模，使町人階級抬頭、城市中的世俗文化趨於多采多姿，這是眾所皆知的元祿文化特徵。與此同時，參勤交代制及生活習慣導致的武家過度消費，和米價下跌等因素，不僅使幕府陷入財政危機，也讓武家不得不向商人借貸。而幕府又藉由改鑄貨幣，減低其中金銀成分以牟利，使社會又引發通貨混亂，物價上漲更為劇烈，對武家的窮困亦無明顯幫助。而真正涉及較全面的政策，試圖解決此狀況的作為，便是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1684-1751）推行的「享保改革」。吉宗以身作則，提倡節儉，並試圖控制商會，降低物價，以避免米過度貶值。他又藉由增稅、新田開發等方式，最終達到提高年貢量的結果。[74]這些政策中有些與春臺想法相通，但增稅手段也造成農民困境擴大，埋下日後爆發一揆的因素。在這方面，享保改革實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春臺於享保十八年（1733），也就是《經濟錄》成書兩年後，上書予沼田藩藩主黑田直邦（1666-1735），先談災異在中國的政治作用，接著話鋒一轉，直言元祿以來發生的種種災異，並批評吉宗說：

> 享保以來之御政，惡奢侈，好儉素；遠女色，憐萬民……然自登極之初，天災屢降，萬民之心有所不安……「放於利而行則多怨」，孔子之聖言，誠萬世之龜鑑。近年來天災屢降，唯此之故……此後禁一切興利之政，止新田開發之令……則可稍解天下人民之怨。[75]

可見享保改革所為，即便出於改革財政而興公利之心，亦有流於與民爭利之處，這是春臺所反對的。這一點若對照《產語》中強調上位者不可與民爭利處，更

74 可參考〔日〕水林彪，《封建制の再編と日本的社会の確立》（東京：山川出版社，1993），頁 339-346。

75 江戶・太宰春臺，〈春臺上書二〉，《日本教育思想大系》第 15 冊《徂徠學派》，頁 327-329。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所譯。對於新田開發的批判，於《經濟錄》，卷 5 中亦有論述：「新田開發，極大事也。卒爾創事，則多成故田之障……下投上之好而求一己之利，必蜂起而請願其事也。」江戶・太宰春臺，《經濟錄》，卷 5，頁 119-1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明瞭。

上文提到盡地力之說是《經濟錄》和《產語》的共同概念，此外，《經濟錄》說「治天下貴穀賤貨，古之善政也，先王之道也」、[76]「民之業有本末，農為本業，工商賈為末業……農業至難，終歲勞苦而利潤少……羨工商勞苦輕而利潤多，自農遷工商者多矣……國之衰微也」、「米價之高下，民之利病所懸也」、[77]「先王之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78]這些也都是《產語》的重要觀點。春臺在兩部作品中反覆強調這些思想，可以說正針對元祿至享保時期的經濟困窮、米價害農、商業快速擴張等狀況而發。

春臺身為徂徠學派儒者，和徂徠一樣重視以六經為中心的「先王之道」。而援引法家思想，則是為了求其政策上可運用的具體技術。正如《經濟錄》中所說：

> 堯舜以來，歷世聖賢，盡心立言而垂教者，皆此經濟一事也。聖人之道，於治天下國家以外無所用也。孔子門人七十二賢以後，學者皆學此事者也……管仲之政以功利為先，以富國強兵為務……孔子盛稱管仲之功……戰國時，申不害、韓非之徒，以刑名法術說世主，縱非聖人之道，是又經濟之一端也……秦孝公用商鞅而其國強；始皇帝用李斯而六國滅……此二人者乃豪傑，故背聖人之道，別出一經濟。[79]

這裡也可以說明為何《產語》會雜揉儒法二家思想，乃是為了經濟之道的緣故。韓東育勾勒出一個江戶時代新法家的傳承系譜，來說明徂徠、春臺到海保青陵（1755-1817）這一系的思想特色。[80]相較於江戶時代的其他儒家學派，這種以「新法家」來為徂徠學派定位的作法有一定的道理。韓東育企圖藉此顯現出日本近代化的「脫儒」過程，論述法家思想資源在這過程中的作用。因此他形容春臺為「在繼承徂徠以來『脫儒』傾向的基礎上，復將徂徠學本身朝『入法』

76 江戶・太宰春臺，《經濟錄》，卷 5，頁 114。
77 同上註，頁 126。
78 同上註，頁 131。
79 江戶・太宰春臺，《經濟錄》，卷 1，頁 20。
80 韓東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方向進行了大踏步推進……比起徂徠，他的學說顯然已進一步接近『脫儒入法』命題的邏輯終點」，[81]又說「法家的思想和理論……已成為假『聖人之道』的春臺經濟振興策之核心理念」。[82]

不過筆者認為，上述《產語》內容的分析顯示，儒法二家在春臺思想體系中仍有本末之別。所謂的「脫儒」，是因為徂徠學派反對思孟以下的儒家方向（荀子的以禮制心想法可謂例外），試圖回到他們心目中的先王之道。春臺要矯正的是「自宋儒說理而來，至於今七百年，天下夢夢，人不復覩仲尼日月之光……我日本學者亦入宋儒理窟而不得出，百有餘年」[83]的狀況，與此同時，伴隨著六經與孔子的道德論述並未失去其地位，它們一再地出現在《產語》等作品中，而來自法家的技術無法代之為首出。從上述引文也可看到，即便春臺大量吸收法家資源，也不忘在《經濟錄》中對它們和真正的聖人、先王之道有所區別。他也警告讀者說：「不用禮樂，以法令計而治國，乃申不害、韓非、商鞅、李斯等人之道。當時速取其效，故有所便利，然非永安之計，不旋踵而至事敗亂亡，須觀往轍而戒之。」[84]可以說，六經和孔子依然是春臺的最終依歸，正如他的儒者自我認同一般。

這種追尋先王之道的想法，必然具備復古性質。一些關於春臺的先行研究會強調他的反復古傾向，謂其與徂徠有異。例如小島康敬曾說：「春臺……已對先王的禮樂刑政治術不抱有信賴的絕對性。春臺開始對先王制度是否可有效地適用於現狀這一點產生懷疑。他的視角從以過去為中心來看現在，移向以現在為中心來看過去。」[85]韓東育承襲這種思路，說春臺「在自覺遵奉上古『先王之道』的同時，尤為重視代表『今』的『時王之道』」。[86]他們的根據是《經濟錄》在提倡時、理、勢、人情四要素時說的：

> 凡經濟，貴在稽古師古。《尚書》云「唐虞稽古」，言稽堯舜之古。

81 同上註，頁 189。

82 同上註，頁 205。

83 江戶．太宰春臺，《聖學問答．序》，《日本教育思想大系》第 15 冊，《徂徠學派》，頁 69。

84 江戶．太宰春臺，《經濟錄》，卷 2，頁 33-34。

85 〔日〕小島康敬，〈儒教的世界像の崩壊と太宰春台〉，《徂徠学と反徂徠》（東京：ぺりかん社，1994），頁 89。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所譯。

86 韓東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頁 1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堯舜既已稽古，何況後人，可不稽古哉？……稽古而制今宜，則事有條理，其弊不生；不稽古則眩於眼前利害而忘後慮。稽古師古，非謂悉行古政於今世。古政難以行於今世者多矣。[87]

據此，確可認為春臺不以先王之道為首出，也可解釋大量引進法家資源的必要性。但筆者認為此非春臺思想全貌，關鍵在於小島氏和韓氏並未引用完畢的其後文字：

> 然政有大體，不本於古道，不能知政之大體。古者今者，異國吾朝，大體均無交替，故可云必師於古……如大匠有規矩。畫圓依規，畫方依矩。工倕、魯般不取法於規矩，亦不能為方圓之形，此義見於孟子之語，治國無異於此。曰古道不宜於今，如不信醫之古方、廢大匠之規矩，徒勞心思爾，不能成功。[88]

這一段文字可以在徂徠言論中找到近似者。徂徠曾說：

> 聖人者，古之能治天下國家者也。聖人之道，治天下國家之規矩準繩也……夫天下之欲為方圓平直者，必用規矩準繩也。不用規矩準繩而為方圓平直……豈能知歪斜之所在哉？故稽古者，能超然習俗之外，而能知疾病所在。故稽古者非欲其泥古，乃欲其知今也……故稽古者，《書經》開卷第一義，亦治天下國家之第一義也。[89]

從旨意到譬喻方式，都可看出春臺繼承徂徠的痕跡。春臺於《經濟錄》卷一的論述，須整段合觀，不宜過度誇大他對時勢的重視，同時須與徂徠之言相對照，方可窺其真意。我們更不能忽略《經濟錄》結尾處，春臺又重申「先王之道悉在六經……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這種徂徠學典型論述[90]，無非是肯定稽古之地位。

87 江戶．太宰春臺，《經濟錄》，卷 1，頁 29-30。
88 同上註，頁 30。
89 江戶．荻生徂徠，〈稽古釋義〉，《徂徠集》，〔日〕平石直昭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三卷（東京：ぺりかん社，1985），頁 182。
90 江戶．太宰春臺，《經濟錄》，卷 10，頁 2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旦確認稽古、師古，乃至依循先王之道在春臺思想體系中的重要性後，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何要以擬古手法，大量參考先秦文獻來寫《產語》了。這正是他追尋先王之道，借擬古而稽古，並期望世人正視之，以救時弊的表現。同時，復古不等於泥古，正是藉由復古才能跳脫眼前時空環境侷限，尋求可用資源。[91]再者，從春臺在《產語》跋文中的「夫古書之逸于中夏而存于我日本者頗多，如古文《尚書》、《孝經》，其昭昭者已」來看，可知對他而言，古書雖成於中華先王之手，但已成中日共享之資源，更重要的是日本保留古書的程度可與中華分庭抗禮。[92]我們可以說：春臺對於日本有資格、有能力實踐中華先王之道的信念，也是他推闡復古的同時，又彷中華古書形式撰寫《產語》的動力。這正是其信念的具體顯現。

不過正是這種復古傾向，使徂徠學派強烈擁護封建制。徂徠曾說：「井田封建者，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大法也。故以封建為非者，非聖人之徒也。非封建則仁不浹於天下。」[93]士族出身的春臺，身為徂徠學派先王之道的追隨者，亦高舉封建價值。他在《斥非》中說：「我日本……及神祖受命，混一海內，因立諸豪傑歸降者為侯，又封子弟功臣……大似三代封建之制。」[94]他又反對柳宗元（773-819）倡郡縣，同撰〈封建論〉一文，曰：

---

91 另外，Tetsuo Najita 曾根據春臺讀貝原益軒（1630-1714）《大疑錄》並加以讚賞的表現，比較益軒與春臺思想，認為雖然兩人分屬不同學派，且一方重科學，另一方重歷史，然皆具濃厚的經驗性格，而共同展現出反朱子學之傾向。其中 Najita 又指出，春臺的經驗性格展現在實際的歷史探索上，並視古典為真理之具體顯現。見 Tetsuo Najita, “Intellectual Change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Tokugawa Confucian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4 (1975): 931-944. 這也確實說明了春臺思想與復古色彩大有關係，值得參考。

92 其中提到的《孝經》，乃春臺曾刊刻之《古文孝經孔氏傳》。其後該書回傳中國，在清朝引起爭議。當前學界研究大致認為，此書縱非孔安國所作，亦非春臺所偽造，而是來自於隋唐以前之另一古本系統。可參考陳金木，〈古文孝經孔傳作者問題重探〉，《國文學誌》第二期（1998 年 6 月），頁 1-38、〔日〕佐野大介，〈『古文孝経孔氏伝』偽作説について〉，《待兼山論叢　哲学篇》第 34 巻（2000 年 12 月），頁 29-41、顧永新，〈日本傳本《古文孝經》回傳中國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第 2 期（2004 年 3 月），頁 100-108、陳鴻森，〈《孝經》孔傳與王肅注考證〉，《文史》第 93 輯（2010 年 11 月），頁 5-32。

93 江戶・荻生徂徠，《譯園隨筆・卷之四》，〔日〕吉川幸次郎、丸山真男監修，《荻生徂徠全集》第 17 卷，頁 172。

94 江戶・太宰春臺，《斥非》，〔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第四卷（東京：鳳出版，1978），頁 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夫封建者，聖人之制也。不徒所以推恩報功，親親賢賢，外以防禦夷狄，內以藩屏王室，天下之利，莫大於斯……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秦人毀井田而為阡陌，廢封建而為郡縣，不遵先王之法，而用商鞅李斯之議，不智哉。[95]

他主張封建制為先王之道，可使人民親附其上，並能有效抵禦夷狄。自秦漢廢封建行郡縣以後，夷狄便成大患，抵抗力量大減，其因在於郡縣制下，官吏無長久經營之心，人民缺乏向心力，軍隊也淪為烏合之眾。但人們去古已遠，不識先王之道，故維持郡縣制，實屬大謬。至於周朝行封建制而滅亡，他則解釋：

> 惟立法於善而時修之則長久，立法於不善而不見其弊則亡速，是必然之理也。夏后氏有天下四百有餘年，殷六百有餘年，周七百有餘年，而為戰國秦漢已後，寧有是歷數邪？我故曰郡縣不可以為天下。苟非達于稽古者，其孰知之？[96]

可以清楚看到，春臺的封建制思想和他的復古傾向是分不開的。他提出的封建優於郡縣的理由十分牽強，但從復古傾向這一點來看，封建在他眼中可謂能長治久安的先王之道，只要隨時勢變易而調整措施即可。此外，日本幕藩體制便是建立在武力和血緣關係之上的封建制，與士族倫理觀密不可分。春臺對封建制盛讚曰「吾儕小人生于今世，親見此美，豈非幸乎」，[97]乃時代影響所致。事實上不只春臺，正如渡邊浩所指出的，面對江戶時代的長期和平，包括徂徠學派在內的一些儒者們，都將當時比擬為中國之三代。[98]如果將春臺對封建制的擁護與其經濟思想合觀，也可看到其政策構思適宜行於封建制。從《產語》中可知，春臺嚮往的是人民不隨意遷徙和轉業，幾無流動性的社會。[99]同時政

95 江戶・太宰春臺，〈封建論〉，《春臺先生紫芝園稿》，〔日〕小島康敬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六卷，頁 80-82。

96 同上註，頁 82。

97 同上註，頁 80。

98 詳見〔日〕渡邊浩，〈「泰平」と「皇国」〉，《東アジアの王権と思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頁 148-153。

99 這方面的思想資源，除了《管子》等中國古籍之外，很可能也包括荻生徂徠在《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府要能夠強而有力的控制商業，雖然一方面肯定商人存在的重要性，才能有人負責在「盡地力」時使貨品互通有無，達成社會整體分工合作之體系，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商人恣意操弄價錢，盡可能將商業行為收歸於統一控制之下。他更藉由四民說來貶低商人地位，以免其凌駕於士農之上，這也等於希望階級保持恆定而不變。凡此皆為與封建制關係較密切的想法。

另一方面，春臺乃至徂徠所面對的這種元祿以降之困境，正如丸山真男所強調的，代表著對封建制的極大動搖。[100]那麼，為了解決這種困境而試圖回到對封建制的強化，是否有效呢？韓東育認為這是春臺思想的矛盾所在，由於當時環境已朝向貨幣經濟社會產生質變，按照春臺的政策走下去，也無法實現封建社會，故只能留下矛盾。[101]筆者認為此說可採。此外，即便按照春臺的政策而取得國內一時穩定，但長遠來看，要真正維持階級恆久不動，則等於產業結構不能有劇烈變動，這就必須使科技水準和國際貿易環境不能改變才行，但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在維持幕藩體制與鎖國政策的春臺當時，這一點可能不會成為問題；但列強叩關的時刻終究會來到，科技與學術不能不往前發展，江戶時代是否真能如春臺所想的「立法於善而時修之則長久」，而「修」的範圍完全不會動搖到封建制本身，就值得懷疑了。

另一方面，正如日裔美國學者 Tetsuo Najita 所指出的，春臺面對的是元祿時代以降，士族深受米價波動所影響，陷入經濟困窘的狀況。雖然春臺提出了「節儉」的對策，但此呼籲與其說是根源於道德規範，不如說是經濟利益考量，

談》中表現的觀點。徂徠說：「三代之古、異國之近世，又我國之古，其治之根本，皆在使人固著於其地，此治之根本也。使人固著之法，乃戶籍與路引（按：旅行證明文件）二者。據此，世間無不明之人，且可管理行動，萬民悉於大人掌握中。」見江戶・荻生徂徠，《政談》（東京：經濟雜誌社，1894），頁 20。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所譯。有關戶籍和路引的實施與作用，在《政談》第一卷中另有論述，其中也提到，戶籍制可使政府了解相應於人口數而應有的農產量，而且為政者須知農為本、工商為末：「須知立戶籍而使人著於地之法，乃古聖人之深智。重本抑末，古聖人之法也。本為農，末為工商也。」（頁 30-31）因此也可以說春臺繼承了徂徠在這方面的政策，而為《產語》思想來源之一。徂徠所言之「異國」即為中國，相關管理方法參考了秦漢帝國編戶齊民的制度。相關探討可見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 79。

100 詳見〔日〕丸山真男，〈近世儒教の発展における徂徠学の特質並にその国学との関連〉，《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頁 118-130。

101 詳見韓東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頁 209-2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仍然將重心放在封建制的鞏固，以及物價控制的強化之上，因此很難根本地解決當時的經濟問題。[102] Najita 的分析對象為《經濟錄》，而透過本文上一節的梳理，事實上也可看到這種思路也正顯現於《產語》中。雖然春臺在談論節儉時，也帶入道德論述，但假若依春臺之策而行，讓封建制下的政府與士族強力控制物價，又有何機制真能使士族改變奢華習慣，在此處防堵人情流於放蕩的一面，而真能由此改善經濟，使封建制本身不崩潰？實難言矣。綜上所述，不得不說，《產語》用心良苦，為救時弊而發，但其中所隱含的這些缺陷，仍是春臺無法解決的問題。

五、結論

本文以江戶時代徂徠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太宰春臺，其經濟思想著作《產語》為研究對象。首先針對作者問題，整理不同說法，並判斷《產語》此書係春臺所作。接著根據書中內容，將其思想結構分為治生原則與國家政策兩個層面來探討，並歸納出其中的生產、節儉與儲蓄這三個共通要素，作為貫串《產語》全書的基本原則。而在國家政策層面的生產部分，春臺的具體主張為「盡地力」，亦即提高整體生產量，盡量開發各地資源並互通有無。此外，最重要的一環是重農抑商、貴穀賤貨，透過維持米價恆定，由中央控制商業的方式來杜絕商人操弄空間。至於春臺此書的思想屬性，乃儒法雜揉，而以儒家民本、仁政概念為最高原則，以法家之政策技術為其輔翼。

最後筆者指出，《產語》和《經濟錄》都是為了解決元祿至享保時代的經濟困境而發。春臺身為徂徠學派儒者，強調以六經為中心的先王之道，在構思經濟政策時也以此為依歸，並採納具有高度現實技術關懷的法家作法，最終形成的便是以擬古為寫作形式，以儒法二家為主要思路的《產語》。但春臺基於思想傾向而擁護封建制，其政策構思也以封建制下的環境為主，這一點無法達到長久而靈活地對應現實的目標，是為其缺陷。

《產語》乃是春臺消化秦漢各家古籍而鎔鑄為自身經濟思想，又藉由擬古手法而成的日本漢文作品。除了上述探討之外，《產語》的相關研究當有可再深入之處。歷來涉及《產語》內容的論著尚少，若能進一步詳細與《經濟錄》、《經濟錄拾遺》進行異同比較，乃至與徂徠政論並觀，當可有助於更了解徂徠學派政論的面貌。此外，《產語》具體來說，對吉田松陰及其弟子們造成了什麼影響？是否可從松陰本人的作品，乃至與松下村塾有關的材料中一窺端倪？

102 詳見 Tetsuo Najita, “Political Economism in the Thought of Dazai Shundai (1680-1747),”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4 (1972):821-8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凡此種種，當俟諸來日再探。[103]

筆者想在最後提出《產語》的可供參考之處。儘管隨著時代演進，貨幣經濟的發達只有趨於隆盛而不可能倒退，但人們對農業的需求不會消失，農業工時長、利潤薄的狀況時至今日也並未真正解決。以當代而言，在氣候變化劇烈影響生產、供需與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糧食危機早已是全球性議題。《產語》所描述的農業困境，即便在當代仍然適用。我們即便不需要走壓制商業的法家統制路線，但如何透過政策的完善，使農業得到穩固的發展，得以永續經營，並盡量彌補農人工時與利潤不平衡的狀況，始終需要慎重思考。這也可說是來自《產語》的呼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03 此點承蒙匿名審查人指出，在此表示感謝。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一）中國古籍

先秦・管仲著，江戶・安井息軒纂詁，《管子纂詁》，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

漢・劉安編，高誘註，《淮南子》，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

清・阮元，《禮記注疏》，《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五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7。

（二）日本古籍（1868年以前）

江戶・太宰春臺，《斥非》，〔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第四卷，東京：鳳出版，1978。

———，《聖學問答》，《日本教育思想大系》第15冊，《徂徠學派》，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79。

———，《經濟錄》，《日本教育思想大系》第15冊，《徂徠學派》，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79。

———，〈春臺上書二〉，《日本教育思想大系》第15冊，《徂徠學派》，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79。

———，《產語》，《日本教育思想大系》第15冊，《徂徠學派》，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79。

———，《春臺先生紫芝園稿》，〔日〕小島康敬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六卷，東京：ペリカン社，1986。

江戶・安藤昌益著，安藤昌益研究會編，《安藤昌益全集》，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1995。

江戶・荻生徂徠，《政談》，東京：經濟雜誌社，1894。

———，《蘐園隨筆》，〔日〕吉川幸次郎、丸山真男監修，《荻生徂徠全集》第17卷，東京：みすず書房，1976。

———，《徂徠集》，〔日〕平石直昭編，《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三卷，東京：ペリカン社，19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江戶・原念齋，《先哲叢談》，東京：有朋堂書店，1929。

二、近人論著

〔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

〔日〕小島康敬，《徂徠学と反徂徠》，東京：ぺりかん社，1994。

〔日〕水林彪，《封建制の再編と日本的社会の確立》，東京：山川出版社，1993。

〔日〕永吉雅夫，〈太宰春台と産語〉，《追手門学院大学文学部紀要》第23期，頁301-314，1989年10月。

〔日〕佐野大介，〈『古文孝経孔氏伝』偽作説について〉，《待兼山論叢　哲学篇》第34期，頁29-41，2000年12月。

余英時著，程嫩生、羅群等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李達嘉，〈從抑商到重商：思想與政策的考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2期，頁1-53，2013年12月。

屈萬里，〈產語的著者問題〉，《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第2卷第1期，頁6-8，1968年7月。

侯家駒，《先秦法家統制經濟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

〔日〕前澤淵月，《太宰春台》，東京：嵩山房，1920。

〔日〕神谷正男，《産語―人間の生き方―》，東京：明徳出版社，1997。

———，《産語の研究　校注篇》，東京：書籍文物流通会，1962。

———，《產語的著者問題：從論理與論證答屈萬里先生》，作者自費出版，1969。

〔日〕神谷正男編，《産語とその批評》，作者自費出版，1964。

梁容若，《現代日本漢學研究概觀》，臺北：藝文藝書館，1972。

陳金木，〈古文孝經孔傳作者問題重探〉，《國文學誌》第二期，頁1-38，1998年6月。

陳鴻森，〈《孝經》孔傳與王肅注考證〉，《文史》第93輯，頁5-32，2010年11月。

〔日〕渡邊浩，《東アジアの王権と思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臺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韓東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

藍弘岳，〈「武國」的儒學——「文」在江戶前期的形象變化與其發展〉，《漢學研究》第30卷第1期，頁239-269，2012年3月。

顧永新，〈日本傳本《古文孝經》回傳中國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1卷第2期，頁100-108，2004年3月。

Najita, Tetsuo “Political Economism in the Thought of Dazai Shundai (1680-1747).”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31.4 (1972): 821-839.

Najita, Tetsuo “Intellectual Change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Tokugawa Confucian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4 (1975): 931-944.

三、網路資料

国文学研究資料館，近代書誌・近代画像データベース，http://base1.nijl.ac.jp/~kindai/index.html。 查詢時間：2015年8月28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Reinvestigation of Dazai Shundai's *Sango*

Chen, Wei-ch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Sango* 產語, a book about economic thought written by Japanese Confucian Dazai Shundai 太宰春臺 (1680-1747). Firstly, based on my study in philology, I point out that the author of *Sango* is Dazai Shundai. Secondly, I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thought in *Sango* and explain Dazai Shundai's economic policy in order to highlight his ideas on developing agriculture and controlling commerce. Thirdly, I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zai Shundai's economics thought and the Sorai School 徂徠學派 for the explanation of why he wrote *Sango* and the values and the limits of it.

Keywords: Dazai Shundai 太宰春臺, *Sango* 產語, the Edo Period, Japanese Confucianism, the Sorai School 徂徠學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